第一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第一节　一般性问题

一、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并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实现这一政治路线

20世纪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政党作用的急剧增长，当今世界上有 90％的国家实行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在多数情况下，政党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活跃、最有能量的政治主体。

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和能量最大的政党。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特征就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内容有两个：一是制定一条政治路线，并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全面实现这一路线；二是加强自身建设，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顺利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作用首先就是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科学根据的政治路线。执政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如果说，过去主要是破坏旧世界，那么，执政以后，就主要是建设新世界。

随着党的任务的变化，党必须适时地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确立和坚持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执政党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第一，只有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才能使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之上，使之更加巩固，作为这个政权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第二，只有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生产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人民得到了更多更好的实惠，文化精神生活丰富了，人民才能从自己切身利益中感受到党的领导的正确，从而真心诚意地拥护党的领导，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的 30 年中，对这一原理的认识和实践有一个曲折的过程，经历了一条“之”字形道路。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八大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又逐步推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冲击了经济建设，使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分割开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的错误倾向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阶级斗争同经济建设之间关系的理论，把剥削阶级消灭以后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到全局范围，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党内，把所谓的路线斗争同阶级斗争混同起来，强调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推动其他一切工作，因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安定，妨碍和干扰经济工作这个中心，党的建设一度失去了正确的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这个惨痛的经验教训，坚定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又强调思想政

治工作的重要性。既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又指出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这样，在理论上，在政治路线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辩证关系的原理。

但是，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并不等于在实践上解决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并不等于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治路线要在实践中贯彻和坚持，仍然有相当的困难。因为，第一，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赖以存在、发展、泛滥的社会历史心理根源并没有因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提出而自然消除，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水平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质变式的飞跃；第二，“文化大革命”后，许多党员、干部因深受“左”倾路线的迫害，从心灵深处留下了“内伤”，他们厌恶“左”的一套做法，转而不加思考地笼统反对政治，将政治、阶级斗争混同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而，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形势下，容易发生只顾经济、不问政治的倾向。

综上所述，执政党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历史环境中，真正做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以保证政治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理论和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加强党的建设是一条根本途径。

二、加强党的建设，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全面贯彻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给党实现自己的使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首先，党可以通过国家政权领导人民制定和执行宪法和法律，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方向和行动准则，从而保证和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发展。其次，党可以通过国家政权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民族的思想境界，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

巩固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最后，党可以通过国家政权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使之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促进中国的繁荣富强。由此可见，取得政权，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但是，要充分正确地利用执政地位所带来的这些有利条件，还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权力，如何运用权力。所谓执政地位带来的“权力的考验”是指：

第一，为什么人掌权的问题，即为人民掌权还是为个人或小团体掌权的问题。执政党的许多党员和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担负着领导职务，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如何运用这种权力，怎样对待这种权力，是为私还是为公，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对国家的领导，是受人民的委托，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如果没有这种觉悟，就可能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变成脱离群众，甚至与群众为敌的腐败分子。刘少奇曾经指出：“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象安泰〔1〕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2〕张闻天在“文革”期间写的一篇文章中严肃指出：“（执政）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前，固然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危害性也更大。”〔3〕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绝大多数党员和党的干部经受住了权力的考验。他们无论在顺利时还是在逆境中，都始终没有忘记为人民掌权，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但是，也有一些党员和党的干部经不起考验，在权力面前昏昏然，追求个人私利，搞特殊化，搞特权，侵犯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头

上的老爷。从而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了党的威信。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4〕如何从思想上、制度上消除腐败现象，无疑是执政党要十分注意的问题。

第二，在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客体所及范围非常广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监察、人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实行无可争辩的政治领导；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对党内上至中央，下至基层支部实行坚强有力的领导。放弃任何一方面，都意味着党的领导的落空。第二，又要充分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注意执政党对各方面各层次实行领导的方式、方法，也即执政方式问题。正是在这一方面，现行的领导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病。例如：（1）权力过分集中。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史上多次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5〕(2)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中，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又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3）家长制作风。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家长制作风等问题，有的领导干部不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别人都要唯命是从。（4）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在执政条件下，在如何领导国家政权问题上，往往容易发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党的组织包揽行政机关和行政部门的事务工作的结果，既使各级政权机关和行政部门不能充分发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己的作用，又使党不能集中精力研究解决大政方针问题和自身建设问题。

如何改变执政过程中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改革不适应新时期要求的领导制度，就成为党的建设的又一重大课题。

第二节　改革开放给党的建设带来的新问题

一、经济体制改革给党的建设提出的新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并不是在执政的道路走得非常顺利和富有经验的条件下提出和展开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左”倾僵化思维方式的前提下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思想僵化，而思想僵化又同政治体制上的权力过分集中相互作用，思想状况与制度状况密不可分。由此，在提倡解放思想的同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一方面，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另一方面，思想僵化同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之间又有必然联系，思想僵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固定化。

通过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中心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僵化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中国共产党所直接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正如邓小平说的那样，是旧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上存在着一系列与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调动和发挥地方、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如何提高效率，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问题。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从而在历史性

转变过程中形成了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此后，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

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第四季度，社会上出现了几股新的不正之风。来势异常凶猛，它们蔓延相当快，从中央部门到省、市、地、县、乡，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且，有的还是一些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带头刮起来的，有相当一批党员、领导干部（包括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和干部子女卷进去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不正之风面前，有些党员和干部，不是出来坚决抵制，而是自己也参与其中。

这些不正之风，它们的表现形式尽管不同，但总的手法和实质却是一样的：都是打着“搞活”、“改革”的旗号为个人或小单位谋取私利，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都是搞乱经济、妨碍和破坏改革的行为。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发生的。党内不正之风的出现和蔓延，给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突出的问题有以下两个：

一是在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党性觉悟。说到底，这是理想问题。

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思想会产生某些消极影响。首先，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有可能侵入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为了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必须破除一切有碍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制度、规章、办法和作风。但是，决不能让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党内政治生活领域。在现实生活中，要划清这个界限，有时并不那么容易，但这个界限又必须划清。如果模糊这个界限，把党的原则拿来做交易，那么，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就会同资产阶级政党相等同。在新的不正之风中，在有

些党员干部之间，你投之以桃，我报之以李，相互提携，彼此受惠，把党的原则，把人民给予的权力，当作商品买卖，在党内搞起了交易所。因此，要防止和杜绝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政治生活。第二，商品、货币具有诱惑力，容易使某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为之所动而丧失其先进的品格。作为共产党人，应有远大的理想，不能以追求金钱为目的，不能“有利就想”。在思想上，必须同“金钱万能”的价值观念划清界限，不能作金钱的奴隶而见利忘义。在同商品、货币打交道中，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第三，随着对外开放的加快和深入，一些腐朽的和反动的东西会乘机而入，容易使党员思想受到侵袭而变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要学习经济发达国家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但是，决不能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能学习和引进各种腐朽和反动的东西。

在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放松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放任某些党员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乘改革之机谋取私利，中国共产党就可能在腐败中变质，在金钱堆里丧失执政地位。

二是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增强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法纪观念。这是纪律问题。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为了搞活经济，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统得过死的状况，给经济单位“松绑”。但是，有的党员干部误以为党的纪律也要“松绑”了，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等同起来。一些同志的这种误解，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由于 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结果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

失去了活力。而这一切在当时都是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党的纪律保证加以实行的。当中共中央决定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给企业放权、“松绑”的时候，这些同志误以为政策上给企业放权，“松绑”，党的纪律也应当放宽，“松绑”。应当懂得，党的政策是中央根据形势和任务制定的，它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是会发生变化的；而党的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行为规则，其基本任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要保证党的现行政策贯彻落实，保证全党步调一致地去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

有的人说：“强调党的纪律，会妨碍搞活，妨碍改革。”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对经济活动中的不正之风明令禁止，但有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却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自行其是；或者改头换面，敷衍搪塞；更有甚者，对各种不正之风竞相效尤，相互攀比，愈演愈烈，极大地败坏了党风、社会风气，败坏了改革的形象。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不断创新而又极其复杂的工程。由于没有经验，加上党员素质不能适应新形势，开始时出现一些不正之风，本来并不可怕，可以用党纪国法规范校正党员干部的行为。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目无组织，目无党纪、国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改革中出现的危害最大的不正之风。

邓小平指出：“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6〕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保持一致的集中体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不但使党无法迅速及时有效地纠正党内不正之风，而且还导致了中央许多决策在执行过程中半途而废，或严重扭曲，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党的统一领导的危害。

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纪律，维护党的统一领导，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

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针对党内不正之风和纪律松弛现象，邓小平强调：“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7〕这两段话是邓小平于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的。由于各种原因，党的理想和纪律教育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4年之后，邓小平在反思十年改革开放的失误时，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误列为十年改革开放中党的工作的“最大的失误”。〔8〕由此可见理想纪律教育在新时期党的建设工程中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二、政治体制改革给党的建设提出的新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这一矛盾成了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给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全新的问题。主要是下面二个问题。

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坚决下放权力。这就使党的建设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在党政分开的新体制下，如何切实把党的自身工作更好地管起来，坚决而有效地避免导致党不管党、党政分家的消极被动局面。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党要管党。早在建国初年，毛泽东就针对当时存在的某些党不管党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党的组织发展了，却反而导致没有人来管理我们党的事务了，这是危险的，不能再继续下去。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分析了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指出了党要管党的极端重要性。在1962年底中央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又再三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法宝之一，执政党永远要注意党的建设，永远不要忽略党要管党。中共

中央对这次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尖锐地告诫全党：党不管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实现，党的组织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这说明，从思想认识上说，中国共产党从未放弃过党要管党的原则。但是，从客观实践上看，较长时期以来，虽然中央不断提出要把党的建设列入党委的经常工作，实际上党委却往往被繁杂的日常经济工作和大量的行政事务捆住了手脚，党的建设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多次想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搞了多次整顿。从1983年开始的为期三年半的全面整党，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党不管党的问题还仍然存在，党组织的行政化和官僚主义现象，以及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还未能得到根治。

经过一段时期的宣传，党政不分，极为过于集中的弊端已经开始被认识：

第一，党政不分不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而是削弱了党的领导。党政分开才能真正提高并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真正提高党的政治领导水平。

第二，党政不分使党顾不上抓党的建设党政分开才能真正做到“党要管党”。

第三，党政不分使党委处于行政作的第一线。甚至成为矛盾的焦点。党政分开，可以使党处在驾驭矛盾和总揽全局的地位，从而发挥“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第四，党政不分使党委自己成了执行者，党政分开才能使党委真正具有监督的职能。

邓小平于1980年1月16日，提出了两点。一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9] 二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10] 从而说明改善党的领导的方向必须明确，方法论问题也必须解决。各级党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织和党员干部都面临着一个由传统的自己所熟悉的领导方式，向先进的更有成效的但却是不熟悉的领导方式转变的考验。如果考虑到一些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思想素质、传统教育等方面相对落后陈旧的实际状况，并对它有一个充分的客观的估计，党就必然将很大一部分精力集中在帮助这部分同志主体素质的提高工作上，并要注意防止党政分开过程中可能出现和已经出现的“党不管党”“党政分家”现象再度发生。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明确规定了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是指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就使党的建设面临着又一个复杂的问题：即在限定它的领导范围和方式的前提下，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全面性和彻底性，防止对重要战线的领导权的削弱或丧失，避免因某一重要战线的领导地位的削弱或丧失而危及其执政地位。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由于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必须领导一切”的原则，有认识上的偏差，以致形成了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的弊病。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是必然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党的领导在某一重要战线被削弱的可能。再加上历史原因，这种可能性会变成现实，危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了。如在一段时期内，党对意识形态战线领导的软弱涣散状态就迟迟得不到纠正，给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现实威胁。

除了以上两大问题之外，政治体制改革使党和政府的各级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更大了，他们面临着如何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学会用新的领导方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对广大党员干部如何过好权力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对外开放给党的建设提出的新问题

对外开放是要有勇气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向经济和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国内大多数人看到了以前封闭状态下看不到的外面的世界，也使国外敌对势力看到了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会”。

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改革、调整的潮流,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有所侧重地进行改革和调整。资本主义国家自60年代初以来,连续8年经济平稳发展，7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危机,但从1982年美国走出危机之后，整个西方世界转入复苏，持续发展达八九年之久，成为二战以后最长的一次经济回升。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实力不断增强。同时，共产主义运动却走向低谷。

围绕着综合国力竞赛，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和角逐，科技、经济的作用明显上升。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方面的落后状况，使它们要向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在科技、经济竞争加剧的同时，合作和联系也增加了。这就使得西方国家可以凭借其科技和经济上的明显优势，利用合作和联系，一方面搞经济渗透，另一方面搞意识形态渗透。

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强烈反差和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强大攻势使得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在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不满。

1989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处于非常危急的状态。尽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平息了这场风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中国又面临着西方的经济制裁，西方世界里掀起了一股反华的浪潮。

总之，在表面平静的国际环境中，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息，在意识形态领域甚至变得更加尖锐、复杂。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长期战略。这就给党的建设提出了又一个重大的问题：如何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经受住考验。

第三节　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

一、思想建设

1966 年，毛泽东对执政 17年后党的状况不满意，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重建一个能领导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党。为此，他发动了整党建党运动，提出了五十字建党大纲：“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建党路线导致了党的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灾难性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否定了“左”的五十字建党大纲，提出了“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建党纲领，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建设的方向。十三大根据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形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确立了“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从而具体地指明了现阶段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方向。

新的建党大纲确立之后，关键在于实践。新形势下的党建实践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作指导，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这就决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实践必然带有某种探索的性质。

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主要环节。从党建理论上看，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大体可分两方面，一是思想理论建设，二是思想道德建设。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指导，使它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认识向导；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从而使它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道德楷模。两者结合，使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在于：

首先，社会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这就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理论的功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增强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第二，中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在生产力和人均国民收入方面并没有优势，相反，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方面尚处于劣势。在这种世界经济格局下建设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十分强调思想理论方面的建设，通过客观、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提高对自身利益的觉悟，防止产生非理性的盲目崇洋情绪。

第三，中国是一个文化、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这种国情也反映到党内，党员、干部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状况下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第四，国际敌对势力推行的“西化”、“分化”战略，究其实质，无非是“强权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它所宣扬的价值观之所以能暂时打动一些人的心，基本上是靠它的非理性化倾向。当代国际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是情绪化，它经不起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检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是抵御“西化”“分化”的有力武器。

第五，中国共产党大多数成员是好的，他们有为人民服务的

愿望。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犯的错误，特别是一些重大错误，都是认识论上的错误，是基于思想理论水平不高，对形势判断失误所造成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这种国情，使得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具有十分强烈的愿望，迅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造福人民，缩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就容易犯急性病，只有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才能避免这种急性病。

最后，只有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才能真正加强党的建设。历史经验表明，政治上出问题，往往是从思想混乱开始，而思想混乱，又常常是由错误理论产生的。因此，要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必须维护党内的思想统一，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水平是很高的，它是在不断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目前，党仍然面临着新的执政环境下出现的一些十分重大复杂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党才会继续做全中国人民的认识向导，才会赢得人民的信任。

90年代党的思想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提高。只有理论研究加强了，理论水平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搞好，才能有说服力，才能动员群众，深入群众，争取最广泛的人心，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党组织才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员才能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

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在于：

首先，社会稳定和执政党党内的稳定离不开道德建设。执政党成员的道德状况决定着这个党的前程是否远大。道德建设之所以有如此的威力，成为社会稳定、党内稳定的关键，是因为道德建设具有乐民安邦安党的作用。道德比政策和法律以及党内规章制度更具有群众性、社会性。执政党成员的道德风貌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而执政党成员的道德风貌并非全部取决于它的党规党法是否齐全。因此，在进行党的建设

时，一方面要加强党规党法的制订和法制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党员的道德建设，提高党员的道德水平。

第二，中国文化传统久远，素称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情条件下建设党，更突出了党的思想道德建设的重大意义。群众习惯于从道德行为上去评价一个党员的好坏，估量一个党员口头上说的是否真实可信。重道德评价，是蕴藏于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本质思维方式，是一种深层次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尽管这种心理结构是朴素的，有时表现出某种片面性，但党的建设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在中国这样一个提倡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建设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十分注意提高党员的道德修养。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突出了道德建设的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提到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首位，通过延安整风，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政治现象的认识水平朝科学化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懂得执政地位的取得，“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党成为执政党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时，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突出课题。执政党干部手中有权，如何运用这种权力，是为一己之利还是为人民的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政干部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共产党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不同于以往任何统治阶级的崭新的道德风尚，以优良的党风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第四，80年代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作风如何，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在改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